

· 明清史研究 ·

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及救灾措施

张艳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 北京 100101)

【摘要】永定河为京师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保障,但是,历来水患频繁。文章以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为例,对灾情及救灾措施进行探讨。此次救灾活动应该是嘉庆时期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其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传统荒政的作用日益降低。

【关键词】嘉庆六年;决口;救灾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9-0175-02

作者简介:张艳丽,女,河北唐山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水灾是清代京师为害较为严重的一种自然灾害。永定河决口是导致水灾的主要原因。如嘉庆二年京师地区降雨量大,永定河水漫溢,下游良乡、涿州、宛平、固安等县,及近山沿河低洼处所被淹,房屋坍塌。而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是一次特大水灾,对人民的打击异常严重。本文拟对此次水灾的灾情及救灾措施进行探讨。

一、灾情

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京师地区遭受数百年最大的水灾。永定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水系。上游流经黄土高原的桑干河,特殊的地形地貌导致水土极易流失,因此,河水夹带的泥沙量很大。中游山势陡峭,谷深岸窄,河水在峡谷中迂回穿行,在北京西郊三家店出峡后进入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河水中泥沙大量淤积沉淀。每遇大水,河道堤防常常漫溢决口,历史上多次大改道。元代时,因河水浑浊,永定河又被称为浑河,康熙三十七年修堤疏浚,河道相对稳定,改名永定河。永定河在北京界内的河段,长约一百六十九公里,流域面积为三千多平方公里,约占总流域面积的67%,这是永定河最重要的一段。永定河为京师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保障,但是,历来水患频繁。

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造成京师地区特大水灾。这年从六月初一日起,京畿一带连降暴雨,持续将近一个月,以致永定河决口数处,河水泛滥,受灾异常严重,“实非寻常偏灾可比”。^{[1](卷八十六)}

京城地区受灾严重,由于连日雨势过大,“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圯者不可以数计”。因水道下游淤塞,“圆明园宫门内外顿有积水”。^{[1](卷八十四)}此外,永定门、右安门、卢沟桥一带水势也极为严重。因猝遭水灾,所住房屋倒塌,居民奔赴附近庙宇暂住。六月初八日,据右营永定汛都司海龄阿呈报,右安门外关厢内增寿庵、三官庙、地藏庵三庙,存留难民四百二十八人。中顶庙内难民千余人。另据左营汛都司王永功呈报,永定门外关帝庙、海会寺、马神庙三处,有难民三百八十三人,土山上还有难民二十多人。据称,仅海会寺附近石家村、邓村、石榴庄、苏家坡等五村被冲塌的土房已达二百余间。^{[2](卷二)}受灾难民远不止此数,到了十八日,右安门外难民“较前多至数倍”。^{[3](卷二)}卢沟桥因桥洞出水不及,被水冲塌,东岸十四号漫开十余丈,西岸一号漫开

十余丈,桥南东岸刷开百余丈。东西两边漫水二三尺不等,桥上栏杆、狮子被打坏,下游民居、田亩被淹。石景山之南,因河水涨溢,自庞村直向东南,以致水电村、衙门口、砖瓦窑、大井、五里店、看丹、丰台、草桥、黄村等处田禾、庐舍都有淹没。长新店以南至良乡等处,水势也很大。洪水之下,“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1](卷八十四)}而且,由于雨势过大,京城内外,许多墙垣房屋坍塌。贡院墙垣、号舍也多有坍塌、渗漏,顺天乡试被迫延期。^{[2](卷六)}据查赈大理寺卿富星额等奏,宛平县被灾八千七百余人,冲去房屋二千三百余间,冲去三十五人。房山县被灾一百余人,坍塌房屋七十余间。良乡县被灾九千八百一十人,冲塌房屋二千八百一十多间。^{[3](卷二七〇)}

直隶众多州县受灾。据署直隶总督熊枚,于嘉庆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奏,除大兴等州县外,香河、霸州、文安、清苑、满城、安肃、定兴、新城、博野、望都、容城、完县、蠡县、雄县、祁州、安州、高阳、新安、河间、献县、肃宁、任丘、故城、交河、平山、冀州、清河、衡水、武邑、赵州、隆平、宁晋、深州、饶阳、安平、大城、永清、东安等三十八州县受灾都非常严重。^{[2](卷七)}另外,邻近直隶的山西、河南州县也有被淹州县。^{[4](卷二八四)}可见,永定河决口成灾的后果是非常广泛的。

二、救灾措施

永定河决口正值白莲教起义期间,灾害又发生在京师重地,所以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救灾主要通过蠲免、赈济、调粟、安辑流民等项来实行,现分别论列如下,并对某些较有特色者进行深入探讨:

蠲免:灾蠲指在水旱等自然灾害之后,对受灾较重地区的钱粮包括田赋和丁役,按受灾程度定出分数,确定全部或部分蠲免。早在顺治年间蠲免即有规定,将全部额赋分作十分,按田亩受灾数酌减,被灾八分至十分者免十分之二,被灾七分者免十分之一。雍正元年对灾蠲则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被灾十分者,免正赋十分之七,被灾七分者免十分之二,被灾六分者免十分之一。乾隆元年又补充规定,受灾五分者亦准报灾,其他规定仍照雍正元年则例,并“永著为例”。永定河水灾发生后,六月初九,清廷下旨免大兴、宛平二县水灾本年额赋。六月十九日,再免受

灾较重宛平县来年额赋,良乡本年额赋。^{[1](卷八十四)}清代中期,奉蠲不实的情况已经出现。积压膏黄即是其中较为严重的一种情况。按照清代则例,凡遇蠲免钱粮年份,各该州县查明应征应免数目,预期开单,申缴藩司,细加核定,发回刊刻,填写各业户收执。并照单开各款,大张告示,遍贴晓喻。^{[5](卷四)}为了防止州县作弊,则例规定如果州县将蠲免钱粮借名肥己,使灾民不沾实惠者,俱照贪官例革职。如果督抚司道稽查不力任不肖州县侵蚀也要受到处分。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肖州县官故意积压膏黄,加紧催征应征免钱粮的情况却很多。嘉庆帝对此弊端也有所意识,因此他在降旨蠲免的同时,还命主管官员对此进行访查严参。^{[1](卷八十四)}

赈济:即用钱粮救济灾民,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措施。清代对赈济有统一的标准:“大口日给米五合,小口二合五勺,按日合月。赈济米数不足者可银米兼给”。赈济按期限可分为急赈、大赈、展赈。京师水灾发生后,清廷六月十八日,拨广储司银二千两赈永定、右安门外灾民。二十四日,发京仓米二千四百石,局钱千缗赈永定、右安门外灾民。二十七日,命再拨大兴仓谷一千石、银二千两接赈被水灾民。^{[1](卷八十四)}七月二十一日,命五城展赈一月。^{[1](卷八十五)}

粥赈也是此次救灾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具有简单易行,经费较省,赈济人数较多等特点,被嘉庆帝所重视。永定河决口后,贫民艰于得食,嘉庆帝下旨在京师设厂。这次粥赈设厂很多,除五城例设外,还于卢沟桥、黄村、采育、东坝、大井等处添设五厂。鉴于此次灾情极为严重,放赈的时间相应延长。京城粥赈一般从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清廷先将粥厂延期至四月二十日,日期临近时,“雨泽愆期,土脉稍形乾燥,恐减麦收分数”,又将五城内外各厂再行展限,“不拘日期,总俟至甘霖大沛之后”。四月二十六日,京师降有透雨,本应停止粥赈,但考虑到端午已近,再一次将五城粥厂展至五月初五日。^{[1](卷九十七)}这次粥赈赈济的灾民很多。如大井粥厂,自嘉庆七年三月初四日起至四月二十日止,领粥人数多达十六万七千二百三十二名,共用米三百五十四石一斗八升二合。^[6]中国历史上历来以全活人数多寡作为衡量救灾成效的标准,中国第一部荒政全书即名为《救荒活民书》。所以,粥赈在活民方面确实是赈济的一项重要措施。粥赈不须审户直接就可进行,作为弥补办赈迟延的一种手段,粥赈对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粥赈的对象是生活状况极其悲惨的人。就粥赈本身而言,它只是活民之策。领赈灾民每天往来粥厂,废时荒业,正常的生产活动被放弃,可见,粥赈作为赈济手段的一种补充政策是可取的,但粥赈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赈济的主要政策。

以工代赈是此次较有特色的一种赈济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工代赈主要是发生灾害后,让有劳动能力者通过参加救灾施工的形式获得赈济钱粮。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程项目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灾后众多的灾民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以工代赈是一举两得之举。以工代赈历代都有实行,但是,嘉庆时期,它的地位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嘉庆帝对以工代赈给予特殊的关注,视以工代赈为救荒良策。他曾说“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赈”。^{[1](卷八十五)}嘉庆六年永定河工为此

时期以工代赈规模最大的一次。当时,工部侍郎那彦宝认为卢沟桥一带工程,需用人员之中匠役居多,挑水挖土、抬运灰石的人夫,有万余人已足够用。嘉庆帝认为“能多一夫,即少一饥民嗷嗷待哺”,^{[1](卷九十四)}指示那彦宝一定要悉心筹划。灾荒导致大量流民,他们是对封建统治的威胁,亲身经历白莲教大起义的嘉庆皇帝对社会的动荡更是有深刻的体会,以工代赈可以吸收大批的饥民,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故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嘉庆帝重视以工代赈与此有关。

嘉庆六年代赈工程包括永定河工及应行疏浚的护城河及早河等处。其中永定河工赈从嘉庆六年七月始至嘉庆七年五月止。许多灾民借以谋生,堵筑永定河漫口、修筑石土各堤及挑挖淤沙等工程用工五万多名,永定河加高培厚工程中共用工两万余人。嘉庆帝对此次工程给予很高的重视,从财力上大力支持。七月十五日拨部库银五十万两、广储司库银五十万两解往永定河工次,采办料物。^{[1](卷八十五)}

以工代赈既可修筑工程,又可救济灾民,是一举两得之举。正常情况下,饥民在领赈的同时,还可以领到工价。但是,很多时候,饥民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价。向来办理工程,一般为工头承揽。“一切雇集人夫,照料收管,皆系工头总司其事”。工头从中中饱,有时,赴工灾民拿不到工价,还可能错过了领赈的时间,以致两无所获。^{[1](卷八十五)}这种情形在嘉庆六年著名的辛酉工赈中还存在,其他工程一般也难以避免。清廷也曾采取措施禁止这种行为,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情况难以根治。以工代赈较之其他赈济措施还有一个特点。它克服了灾民生等其成、不劳而获的等、靠思想,是一种积极的赈济措施。

以工代赈本身是一项很好的政策,但是,如上所述,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影响了其效果。而且,就以工代赈本身而言,它需要具备充分的条件才能进行。如实施工赈的经费、雇募的人员、充足的工料、待修的工程等等。而充足的工程经费是最难筹集的。比如在嘉庆六、七年工赈中,抢修永定河工程总计用银九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两,而永定河每年抢修银定例只有二万九千余两。^{[7](P36)}如此巨额的经费支出如果不是在畿辅重地是很难想象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以工代赈在荒政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调粟:即通过粮食调剂救济灾民,包括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移民就粟是历代调剂粮食所采取的较为普遍的政策。早在汉代就有实行,就嘉庆朝而言,移民就粟并非政府主动行为,饥民衣食无靠,就食他乡,形成流民,从某种意义上说,饥民外出逃荒构成此期的移民就粟。为了防止灾民外出,清廷下令地方官要实力救灾。永定河决口后,八月初十日清廷下旨,地方官实心办理赈济,令灾民安心待赈,切勿擅离乡井。二十一日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地方官认真经理,计口授食,灾民等岂肯轻去其乡”?^{[1](卷八十六)}对灾民外出的根本原因进行揭示。确实,如果本籍实力办赈,灾民自不必外出谋食,因此,清廷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清廷不仅命令地方官实力办赈,而且还让边门章京调查流民原籍,以此督察地方官。京师地处天子脚下,地方官自会非常注意。因此,灾民,尤其是来自邻近京师地区的,赴京师谋食者自然会有。嘉庆帝对流入京师的(下转第80页)

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部门之一;另一方面它也为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旅游业列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

[收稿日期] 2007-04-16

参考文献

- [1] R. F. Engle, C. W. J. Granger.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J]. *Econometrica*, 1987, 55(2): 251-276.
- [2] [美] J. M. 伍德里奇. 计量经济学导论: 现代观点[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3] 匡林. 关于旅游乘数理论的几个问题[J]. 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3).
- [4] 左冰. 中国旅游产出乘数及就业乘数的初步测算[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2, (12).
- [5] 李江帆, 李冠霖, 江波. 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分析——以广东为例[J]. 旅游学刊, 2001, (3).

- [6] 张帆, 王霞霞, 李春光, 耿世刚. 旅游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研究——以秦皇岛为例[J]. 城市, 2003, (5).
- [7] 苏继伟, 邱沛光. 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05, (15).
- [8] 任佳燕, 刘赵平. 用旅游卫星账户测度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J]. 中国统计, 1999, (10).
- [9] 史蒂夫·史密斯, 赵丽霞. 探析旅游卫星账户(TSA)的基本思想[J]. 旅游学刊, 2004, (2).
- [10] 康蓉. 旅游卫星账户及旅游业增加值的测算[J]. 商业时代·学术评论, 2006, (5).
- [11] 鲁明勇, 王玉杰, 王兆峰.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研究[J]. 科技与产业, 2005, (2).
- [12] 赵丽霞, 魏巍贤. 旅游卫星账户(TSA)—1998的构建[J]. 统计研究, 2001, (8).
- [13] 李天元. 旅游学概论[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 [14] 林南枝, 陶汉军. 旅游经济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 [15] 王大悟, 魏小安. 新编旅游经济学[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范巧]

The Analysis of Co-integ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He Xiaohai Liu Xiuyan

Abstract: By means of unit root test and co-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annual economic data from 1985 to 2004.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stable positiv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Key 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unit root test; co-integration.

(上接第176页)灾民主张一律赈济,并认为大量的流民入京表明京师官员办理赈务还是较为认真和卓有成效的。^{[1](卷八十五)}

移粟就民的主要方法是截漕平粜,其次为采买和拨运。灾荒发生后,一般开仓进行平粜或赈济,常平仓谷不足时,截漕、采买、拨运他省粮食被实行。嘉庆六年水灾发生后,六月清廷截留漕米六十万石存贮天津北仓备赈。^{[1](卷八十四)}七月,再截留漕米六十万石,分贮郑家口、泊头及天津北仓三处备赈。清廷还令山东采办小麦十万石,河南采办小米五万石,由水路运往京畿,以备来年平粜之用。^{[1](卷八十五)}

安辑:清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一遇灾害,小民无以为生,纷纷外求食。灾民大量外流,不仅对灾区恢复生产不利,而且流民积聚,容易造成事端。因此,清廷对流民的安辑显得格外重视。安辑措施包括收养流民和资送流民回籍。

资送回籍历代都有实行,资送流民路费始自雍正元年。雍正元年,直隶、山东、河南流民就食京师,经议定每口每程给银六分,老病不能行走者加给三分,为脚力费,委官护送。嘉庆帝不主张资送流民。嘉庆七年,京师粥厂领赈流民很多,有大臣奏请,酌给钱文,资送回籍。嘉庆帝认为领赈人数口众多,更怕资送回籍会引起其他弊端,“若散给钱文,必有今日领钱,明日又诡捏籍贯,交易姓名,重来支领者”,并且还会“滋胥吏等藉词稽查,扰及贫民之弊”。所以嘉庆帝认为“此事断不可行”,^{[1](卷九十六)}嗣后停止资送回籍政策。取消资送回籍制度有一定的合理之

处,确实,有些灾民为了取得资送钱文反复外出,耽误了农事生产,对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极为不利。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取消资送钱文,灾民无衣无食,给顺利回籍造成重重困难。此外,清廷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救灾措施。如命顺天府飭所管州县收养淹毙灾民、刑部清理监狱等,在此不一而足。^{[1](卷八十四)}

此次救灾活动应该是嘉庆时期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其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社会是荒政实施的基础和条件,荒政是社会控制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荒政实行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相应的社会秩序的运行情况。嘉庆时期,王朝中衰,在整个社会制度都发生危机的状况下,国家荒政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危机,政策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荒政的成效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传统荒政的作用日益降低。

[收稿日期] 2007-05-11

参考文献

- [1]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 (清)庆桂等. 钦定辛酉工赈纪事[Z]. 嘉庆七年刻本.
- [3]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4] 李守郡. 嘉道两朝上谕档(嘉庆六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5] (清)汪志伊. 荒政辑要[Z]. 嘉庆十一年刻本.
- [6] 台费荫等. 录副档. 嘉庆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 [7] 李守郡. 嘉道两朝上谕档(嘉庆七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贺永来]